对国家文化安全基本问题的思考

张　安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国家文化安全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然而,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来说,许多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学术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本质、维度、关键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未达成一致。因此,从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界定出发,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维度、关键等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可以深化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研究,从宏观和全局的高度回应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　概念;　本质;　维度;　关键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030－05

长期以来,各国之间军事战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国家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军事安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家安全的内容不断扩展,文化、经济、资源、信息等因素所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近年来,由于全球性文化冲突和碰撞的增多以及文化软实力和文化霸权主义研究的兴起,文化主权、文化认同、文化渗透等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但是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现有研究,往往从实践举措方面探讨具体的现实问题,缺少学理的深度,对国家文化安全基础理论构建的支撑性不强,未能科学地揭示出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问题。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加强文化安全基础理论的研究,科学阐释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问题,成为继续深化国家文化安全领域研究不可回避的任务。本文从界定什么是国家文化安全出发,试图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维度、关键等基本问题进行相关思考和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

一　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界定

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起点和前提。“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我们认为,国家文化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被提出来,就应该有其明确的内涵界定。然而,当前学术界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的界定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虽然,对国家文化安全内涵的多元解读,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张力,扩充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但是对核心概念缺乏统一性的共识,会使研究偏离互动沟通的正确方向而自说自话,产生不了合力效应。这对于形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范式,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安全的理论研究却是十分不利的。基本概念的争鸣往往都是问题研究起初阶段的现象,成熟有效的理论探讨都是基于一定的共识的。只有科学地建构出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与内涵,才能完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解答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通过分析和比较,当前国家文化安全定义之所以存在分歧,主要在于学术界对“文化”、“安全”这两个抽象概念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文化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又难以准确解释的概念。著名人类学家威廉斯曾感言“文化”(culture)是英语中最难理解,最为复杂的词汇之一。正是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学术界研究角度的不同,导致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从而使有关文化的定义达到200 多种[2]。但是如此众多的文化定义却不是都适用于国家文化安全的范畴。我们讨论的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文化,不是广义上的文化,不是文化哲学和人类学所理解的文化;而是一种狭义上的精神观念形态,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3]。坚持狭义角度理解文化,更能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把握文化的本质,明确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内容,避免在文化安全的研究中出现泛文化的趋势。其实,当人们谈论任何一种文化之时,关注的主要是精神内涵、价值追

[收稿日期]　2014－03－30
[作者简介]　张安(1987－),男,湖南常德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求、思想风格等等,并不是脱离这些精神性、观念性的因素来空谈文化。例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地域文化、建筑文化,无论是在学术语境还是在生活语境中,我们都清楚论及的并不是食材酒水、尼龙丝绸、山川河流、砖瓦石砾这些物质实体,而是强调附着在这些物质实体上的精神因素,强调这些物质实体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因此在国家文化安全范畴内,无论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贸易的出超比,还是保护文化遗产,抑或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其实都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确保本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不发生性质上的改变。

安全也是一个颇具争议,尚无定论的概念。有人就提出安全根本无法定义,它是没有任何精确意义的“模糊的符号”[4]。丹尼尔·费雷(Daniel Frei)、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人就认为不同的行为体,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问题,会对安全作出不同的解释[5]。尽管如此,但在日常使用和学术研究中,对于安全,我们还是可以从最基本的共识上对其进行理解和描述。

首先,安全是主体的一种属性。安全不具有实体性的意义,必须依附于一定的主体而存在。美国著名法学家小霍姆斯就曾形象地将安全比喻为一张外皮,指出它的色彩和内容由其所应用的时间和环境决定[6]。主体是安全存在的基础和载体,在研究中离开主体谈安全那是无的放矢,毫无意义。正是基于不同的主体存在,我们才能具体地把安全划分为不同类型来理解和把握,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领土安全、文化安全等等,不同类型的安全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要求。

其次,安全是主体免于威胁的客观状态。虽然辞书中对安全释义中包含有安全感的意义,如《说文解字》中注释即是“安,静也。”表现人的一种宁神度日的心理状态。但是作为主体特有属性,主体的安全状态不会因为主体的意志而发生改变。安全与人对危险和威胁反映所形成的安全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的安全感是主观的,与安全的客观状态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有时现实中危险因素少,人主观上也有可能形成不了安全感;有时即便是客观上存在威胁,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而产生虚假的安全感[7]。

第三,安全具有相对性。事物的状态都是辩证存在的,没有一种绝对的状态。安全也是如此,安全与危险构成了一对矛盾运动,只有针对危险来讲安全才有意义,纯粹片面地强调绝对安全状态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成语“居安思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双方之间具有斗争性,竞长争高,此消彼长,事物的性质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在安全和危险的矛盾斗争中,只有在安全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主体才是安全状态。因而,危险小则安全性大,危险大则不安全。同时,主体的安全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改变,主体的安全态势也会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做一个基本的界定。所谓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存在和传承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安全的状态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辩证运动的。当威胁文化的不良因素增多,威胁到国家观念性的文化的存在,影响到文化健康发展趋势之时,文化就会处于危险的状态。反之亦然。因此要用动态、战略的眼光看待国家文化安全,既要立足于当前危险,维护文化的生存安全;又要着眼于威胁文化健康发展的隐性因素,确保文化的长治久安。

二　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

利益是主体的客观需求的体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利益问题是各种复杂人类活动的终极动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目标导向的作用,统摄着现实社会全局的运动和变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抓住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9]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里,国家利益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依据,也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国家利益因其需求的不同和多样可分为多种类型,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军事利益等等。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态,是最高形式的文化利益。作为一种间接的、深层的、隐约的、曲折的利益表达,文化利益对获取、占有、支配、享用和保障其他形式的利益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国家民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利益的实现可以满足国家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可以继承民族传统、培育时代精神、巩固主流价值,维护文化主权,增强文化软实力,最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等。文化利益关系政权的兴亡更替,民族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安危祸福,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没有文化利益的国家利益不仅不完整,而且难以长久。对文化利益的侵蚀是一种更为致

命、更为危险和更为关键性的安全威胁。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确保国家文化利益不受侵害。

从文化角度看,整个社会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人类活动中无不体现着文化利益。文化主权的独立、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民族文化传统价值的认同、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都是为了保证国家文化利益。一切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总根源就是国家文化利益实现中所出现的矛盾与危机。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丛生。认清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就好比找到了一把解答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钥匙",使我们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家文化安全形势中,透过一系列表层现象,把握住规律,抓住核心,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国际方面,文化同质化趋势席卷全球,各种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显现,各国普遍遭遇到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国家文化主权弱化、传统文化内涵流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恰恰可以体现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利益上的冲突。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和发展环境差异的存在,导致国家文化利益必然多样化。正是国与国之间在文化利益上存在差别,才会使文化平等交流变成思想观念的斗争和交锋,如果各国之间文化利益一直就不存在文化渗透和思想颠覆的问题,各国接受和发展同样的文化即可。国际间文化冲突,根本上需要协调好国家文化利益,寻找文化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国内方面,由于市场本身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分配不公和商品拜物教等弱点、缺陷乃至异化倾向,产生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扰乱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改变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损害国家文化的核心利益。社会上的不良思想倾向,尤其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不相容的,在利益导向上是冲突的。因而要从国家文化利益维护出发,重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三 国家文化安全的三个维度

国家文化安全包含着三个维度,即内外关系维度、新旧关系维度、同异关系维度。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种不同的解读路径,展现出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种基本冲突模式。这三种冲突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往往是共时性地交织出现。因而,在分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我们不能偏重于其中任何一种维度,必须整体、系统地运用这三个维度,科学、全面地认识国家文化安全。

内外关系维度,即从文化主体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中把握国家文化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看成国家主体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以及文化主权的独立与维护。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是开放的,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国际间文化交流越来越便捷,文化的闭关自守、小国寡民的状态已很难在当今时代出现。外来文化与内部文化必然要相遇、交流与碰撞。在内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就存在本国文化主权的保护问题。外来文化作为一种他者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它的传入会使国内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影响到国内文化的独立和完整。邓小平在对外开放初期就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心进行分析和鉴别,"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10]。然而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外来文化冲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根基,改变了这些国家文化的性质,使资本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更多包含了文化、外交等软实力的竞争。"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11]文化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内容,成为实现政府国际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美国《政策评论》就曾宣称:"美国文化软实力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最深广的力量源泉。"[12]文化手段已经成为美国增加其国际影响力,扩张霸权的重要渗透工具。在此种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例如法国就在其贸易进口中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本国文化实施特殊保护政策和制度,澳大利亚政府则严格规定了外来影视节目的播出数量,加拿大政府专门颁布了C-55 法案限制外国期刊发展。在世界经济普遍联系的现实下,文化主体面对外来文化的危险,一般都会进行收敛性的防御,主观地减少与外来文化的联系与交流,防范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基础的解构。

新旧关系维度,即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上把握国家文化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看成本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与创新的冲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中可知,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并不是只来

自于外部,自身文化内部依然存在危险因素。“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13]自身文化如果不能实现很好转型与创新,必然会在文化内部形成威胁文化发展的腐朽落后因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裂了自己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因此,对新的文化因素怎样吸收,对旧的文化传统怎样取舍就形成了文化的安全问题。完全抛弃文化传统,吸收新的文化因素,必然会对文化的民族特质造成损害;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完全拒绝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不依据实践环境的变化对文化进行调整,则必然会在世界竞争中落后,使民族文化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和发展形成数次论争,也形成了两种主张,即鼓吹“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盲目自信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是人们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必须在既有传统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才能真正保证文化的安全。在当前文化安全态势中,文化弱势主体要深刻认识自身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紧迫性和必要性,避免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发展趋向,努力建构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实现本国文化安全转型。

同异关系维度,即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上把握国家文化安全,把国家文化安全看成文化的民族特性与文化的世界共性之间的冲突。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14]。文化的民族性有着无法替代、独一无二的特征。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民族特性,也就丧失了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描述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文化的“整合”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这种“整合”趋势中各个国家产生了认同还是认异的矛盾,国家文化也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出现了不安全。因为在“整合”趋势中,每种民族文化都担忧自身文化的特性流失,尤其是弱势文化主体必须时刻防范强势文化主体将其文化树立为世界普世文化,让文化的世界性等同于文化的唯一性,使世界文化的整合趋势成为“同质化”趋势。其实,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中蕴涵着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文化,当前的世界是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在各国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将会更为明显,世界各国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联合国 2004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便是“当今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在国际社会上呼吁维护世界多样性,坚持对话和交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四　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

一个没有先进文化引领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国家注定是要落后的国家。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曾经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等原生态的母文化都因不能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潮流,不能主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而被历史淘汰。先进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先进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合目的性的一种潜在力量,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等来塑造人们的理想和信念,激发人们的热情和斗志,凝聚社会的共识,从而使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感召力。

国家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国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16]。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只有把握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本国的先进文化,才是对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安全认定。学术界针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从国家战略机制角度出发,提出建立健全文化安全管理和文化安全预警机制;从国家文化的传播角度出发,提出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提升文化产品的出口量;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出发,提出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等等。这些措施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但是,要使国家文化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仅仅依靠这些共时性的现实对策是无法达到的。从国家文化的概念上看,国家文化的安全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文化安全态势是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变化的。我们在应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问题时,要认识到只有把握住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创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引领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才能真正意义上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可以说,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

一般保守的抗风险能力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来说

只是治标之策,只能表面、暂时地缓解危险和威胁,不能对危险和威胁进行主动、深刻、全面的应对。立足文化安全的现实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具体举措,必须围绕建设本国先进文化、突出本国文化的先进性这一关键点。一旦我们现实的具体举措偏离这个关键点,就会使我们的措施陷入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片面地追求文化的“纯洁性”,对抗性地看待国际文化交流。同时不从发展先进文化的角度看待文化安全的维护,就会静止地看待本国文化安全问题,认为通过相关具体措施,形成的安全状态是永久不变的,从而盲目乐观,放松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重视。值得指出的是,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本国的先进文化,是对国家文化安全中多维关系冲突的科学正确的回应,也会避免文化安全维护中的诸多误区,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整个世界文化和谐健康发展。

注释:

① 苗志娟,贾友军在《近5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综述》(2011)一文中指出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概念有4种定义方法,即从哲学范畴定义、从政治范畴定义、从历史范畴定义、从国际关系范畴定义等。另外,赵子林在《近年来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2011)中认为学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界定主要存在客观论和主客观统一论两大类观点。从这两篇研究综述的归纳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2] 郭 莲. 文化的定义与综述[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1):115-118.

[3] 罗文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念论[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110.

[4] 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 非传统安全概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9.

[5] 张幼文,周建明,等. 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66.

[6] 丛 鹏. 大国安全观比较[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3.

[7] 刘起军. 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3-5.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1.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1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8.

[12] 转引自子 杉. 国家选择与国家安全[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318.

[13] 任建树,张统模,吴忠信.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1.

[14] 李宗桂. 简论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J]. 哲学动态,1992(8):21-24.

[15]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

[16] 张福贵. “文化安全”的悖论与“软实力”的正途[J]. 学术月刊,2012(2):13-18.

Thoughts on Basic Issues of Natural Cultural Security

ZHANG A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a new field of research, has become a hotspot which has raised plenty of attention in Academia. Nevertheless, many research work about the basic theory in this field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with ye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its concept, essence, dimensionality and its key factors reaching no agreement. Therefore, starting with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it, the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its essence, dimensionality and key factors can enable the deeper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t, through which we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issues from the macro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ic height.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concept; essence; dimensionality; key factors